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

冯国栋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

冯国栋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冯国栋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9

(宝庆讲诗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7-80254-421-5

I. ①佛… II. ①冯… III. ①佛教-文献学-研究②佛教文学-研究

IV. ①B948②I0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686号

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

冯国栋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00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421-5

定 价: 35.00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

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

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

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

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Contents 目录

001 / 总序 朗宇

文献编

002 / 汉文佛教文献学引论

032 / 佛教目录研究八十年(1926-2006)述评
——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055 / 唐宋亡佚佛教经录丛考

073 / 近现代汉文佛教目录述要

088 / 《宋史·艺文志》释氏别集、总集考

113 / 《宋史·艺文志》释氏著述证误

119 / 《五灯会元》校点疏失类举

146 / 雪峰语录编次考

163 / 慈觉宗贇生平著述考

177 / 《俄藏黑水城文献》通理大师著作考

- 190 / 《俄藏黑水城文献》辽代高僧海山思孝
 著作考
- 202 / 雪关禅师生平交游考略
- 220 / 心镜大师生平考述
- 231 / 杨亿佛门交游考
- 246 / 宁波佛寺志札丛

文学编

- 276 / 刘勰的虚静说与佛家的禅学
- 288 / 钱谦益塔铭体论略
- 308 / 书《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后
 ——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点看法
- 318 / 河东狮吼考源
- 326 / 八十华严《入法界品》文学意蕴
 及其对佛教造型艺术之影响
- 347 / 《大般涅槃经》譬喻研究
- 368 / 后 记
- 370 / 《宝庆讲寺丛书》书目

文献编

汉文佛教文献学引论

方广锬先生回顾近四十年的佛教研究时曾言：“佛教文献学包括佛教文献学本身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经录、藏经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经的编纂及其电子化。目前,我国佛教文献学的工作主要还是后二者。”^①诚如先生所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佛教文献学本身学科体系、对象、性质、特点之探研则寥若晨星,^②而学界对佛教文献学也多有歧解:或以欧美比较语言学方法治佛典为佛教文献学,^③或以中国传

① 方广锬《佛教研究40年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研究四十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② 笔者仅见严耀中先生《试论宗教文献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此文对宗教文献的定义、研究对象、宗教文献的解读等问题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③ 如吴汝钧等人所说之佛教文献学。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

统目录、版本、校勘等法研究佛典为佛教文献学。^① 职是之故，笔者不揣鄙陋，就汉文佛教文献学体系建构做一论述，^②一得之愚，聊作抛砖之试。

一、汉文佛教文献与汉文佛教文献学

(一) 汉文佛教文献与汉文佛教文献群

所谓汉文佛教文献是指用汉文撰录，关于佛教知识的，并与某种特定载体相结合的图书或其他资料。^③ 此定义中应注意者有如下四端：第一、汉文佛教文献是用汉文撰录、以汉字记载的佛教文献，故不包括用梵、巴、藏、蒙等其他文字撰录的佛教经籍。第二、汉文佛教文献既包括中国僧俗翻译、撰著的佛教文献，亦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中僧俗人士所撰著的佛教文献。第三、

① 如多数古典文献学著作提及专科文献学时的说法。

② 任继愈先生曾指出佛教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见《任继愈禅学论集·佛教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28页。方广锠《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经之考察》首次使用了“汉文佛教文献学”这一名词。在此文摘要中，方先生言：“本文依据寺志、佛教经录等相关资料，从汉文佛教文献学的角度，对杭州灵隐寺收藏的一部古代梵文贝叶经进行了考察。”《中华文史论丛》第8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③ 近代以来对“文献”这一名词之理解与解释非常多样，概而言之，则有文史学界与情报图书馆学界两大阵营。文史学界的文献概念一般是指用文字记录的图书或资料，可称为“狭义的文献”；而图书馆学界文献概念则广泛多，如1985年国家标准局批准发布的GB4894—85《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则不仅文字记载的图书等文献包括在内，还包括录音、图像等文献，可称为“广义的文献”。我们此处则取狭义文献之义，之所以如此，乃基于如下考虑：广义的文献概念固然有利于扩展文献研究的范围，然外延过于广大，对于一门学科来讲，则不利于总结规律。因为外延越大，例外越多，规律的普适性越差。因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适当的封闭，对建立比较科学的体系是有益的。

汉文佛教文献是关于佛教知识的文献,这是其不言自明的题中之意,故而与佛教知识无关的文献不在讨论之列。第四、载体的广泛性。凡是用汉文撰录的关于佛教知识的文献,不论其与何种载体结合,皆为汉文佛教文献。故而汉文佛教文献既包括传统载体如纸、金石等,亦包括现代载体如磁盘、光盘等。

文献群是指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一组或一群文献,汉文佛教文献群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加以分类:

1. 根据是否入藏,可分为藏经文献群与藏外文献群。藏经文献群是指为历代汉文大藏经所收录的经、律、论、著述;而藏外文献群是指不为历代汉文大藏经收录而独立流传的佛教文献。^① 藏经文献群与藏外文献群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与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如早期汉文大藏仅收录翻译的经、律、论,而不收中土僧俗所撰写的著作,而后期的大藏则普遍收录有中土僧俗所撰如目录、音义、史传等明教弘道之作。历史上每一次大藏的结集,总有一部分藏外文献变为藏经文献,也会有一部分藏经文献转变为藏外文献。同时,随时代发展,新的藏外文献又会不断产生,从而推动新大藏经的编修,而新的大藏经出现又使得部分藏外文献变为藏经文献。

2. 根据文献的产生方式,可分为翻译佛教文献群与撰述佛教文献群。翻译佛教文献群是指由梵、巴、藏、中亚古语等翻译而成的汉文佛教文献;而撰述佛教文献则是指由汉文化圈中僧俗人士独立撰写的注疏、传记、目录等著作。

3. 根据文献的流传方式,可分为传世佛教文献群与出土佛教文献群。传世佛教文献群是指成文后一直不断流传的佛教文献;

^① 蓝吉富先生将藏外文献分为狭义藏外文献(即佛教徒研究或弘法的著述)与广义藏外文献(散布于世典中的文献,如正史、小说、类书中的佛教文献)。《佛教史科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74页。

出土佛教文献群则是指由地下发掘的古代佛教文献。传世佛教文献群与出土佛教文献群之间也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传世佛教文献会因种种原因而转变为出土佛教文献,如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文献。同时,出土文献如果与其载体、书写方式相分离,而与其他载体结合,即转化为传世佛教文献。如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目录文献,被录文整理、印刷出版为《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则出土文献转化为传世文献。

4. 根据国别的不同,可分为域内佛教文献群与域外佛教文献群。域内佛教文献群是指由中国僧俗翻译撰写,并流传于中国之内的汉文佛教文献;而域外佛教文献群则指汉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僧俗用汉文翻译或撰写的佛教文献,也指由中土僧俗翻译撰写,而流传于汉文化圈其他国家中的佛教文献。^① 域外佛教文献群与域内佛教文献群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五代宋初天台教典回归中土为例,天台教典本为中土僧俗所撰述,后因战乱、毁佛运动不传于域内,而在韩、日等国却得以保存,此时域内文献转化为域外文献。而经吴越钱氏的努力,这些典籍又回流中土,域外文献又转变为域内文献。

5. 根据时代的不同,又可分为古代佛教文献群与近现代佛教文献群。这两类文献群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载体、印写方式与著作形式的不同。如古代文献的载体多为纸、金石,而印写方式主要为抄写或雕版;而近现代佛教文献载体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增加了光电等新载体,而印写方式也发展为铅字印刷、激光照排等。从著

^① 张伯伟师将域外汉籍分为三种: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域外汉籍的主体是第一类文献。《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39页。

作形式上讲,近现代出现了诸如佛教教科书、百科全书、论文、辞典等新形式。

(二) 汉文佛教文献学

汉文佛教文献学是以汉文佛教文献及佛教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佛教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存藏、传播、利用的历史和规律,并为佛教文献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的专科文献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汉文佛教文献学,辨明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文献整理、研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1.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科学虽同属汉文佛教研究的基础学科,然二者却在研究范围、内容、目的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二者研究的范围不同,佛教史科学大于佛教文献学。史科学以史料为研究对象,史料包括三类,即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古遗址、古遗迹、古建筑、古器物)、口传史料(历史传说、史诗);^①而文献则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部分。如佛牙、舍利、石窟、寺塔、佛像、佛教壁画、僧侣日常用具等属于实物史料,是史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却不属于文献的范围。蓝吉富先生《佛教史科学》第六章设有《遗迹与遗物——非文字史料》一节,正可说明佛教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要比佛教文献学更为宽广。

其次,二者研究的内容与目的相异。史科学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鉴别史料的方法,二是按时代、主题等介绍相关史料,三是史料的检索方法。而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献的载体、文献群

^① 近来又有学者提出“网络史料”的概念。陈述《网络史料的优势及应用方式》,《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

的产生、发展,文献整理的方法与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目的在于探寻文献发展与文献整理的规律,以指导文献的研究与整理;而史料学在于介绍、检索、鉴别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服务。文献学着眼于文献的整理;史料学着眼于史料的搜集、鉴别及其价值评判。佛教文献学与佛教史料学虽皆属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佛教史料学更强调实用性。^①

2. 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文献整理、研究

佛教文献学是以佛教文献群、佛教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抽象归纳佛教文献研究中的方法、规律、思想,并用于指导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门学科。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则以具体的、单一的佛教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佛教文献学的方法,对佛教文献所进行的辨伪、注释、校勘、辑佚、标点等具体工作。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佛教文献学的基础,而佛教文献学则是指导佛教文献整理研究的一门学科。二者紧密联系,但又各自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文献整理、研究与文献学的区别,举例来说,陈垣先生对《元典章》的校勘属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成果是“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而在此基础上写就《校勘学释例》总结校勘四法等规律,则属于文献学的范畴。再如清代对古书辨伪的实践为文献整理与研究,而梁启超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将伪书分作十类,则属于文献学的内容。具体到汉文佛教文献,如《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以多种藏经为校本,对佛经进行的校勘工作,即为佛

^① 蓝吉富《佛教史料学》序言云:“十几年来,笔者所开的课,从‘佛典目录学’,而调整为‘佛教文献学’,近几年则改为‘佛教史料学’,这种递嬗调整的考量依据,主要是在佛教研究的实用性。”正可说明佛教史料学更强调其实用性与服务性。《佛教史料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页。